

RC

文化雜誌

澳門文化司署出版



十九世紀的澳門

著名的藝術家、旅遊家眼中的澳門

海軍准將佩里、喬治·布斯凱、馮·舍爾策、

阿爾諾索伯爵、喬治·錢納利、羅伯特·依路特、

托馬士·屈臣、奧古斯特·博爾傑

十六、十七世紀圍繞澳門的葡中關係
安東尼奧·塞吉奧在澳門——一封從未發表過的信
澳門在拉法埃·博達洛·皮涅羅陶瓷藝術中的地位

中文版第七、八期
第二年 第三冊

RC

文化雜誌

澳門文化司署出版

主編

官龍耀

中文編輯

黃曉峰

助理編輯

徐新、周劍明

編輯部秘書

馬安娜

美術設計

繆鵬飛、鄒志全

排版

曾亮文

植字

梁孔彪、林秀華

攝影

鄧顯熙、林國權

印刷

澳門印刷公司

分色

色擇分色有限公司

澳門文化司署出版社

高地烏街27號二樓，電話591977

編輯部

高地烏街27號二樓

電話591977-126

591977-126

出版刊物
文化消息

出版活動

一九八八年第四季度一九八九年第一季度文化活動摘要

講述故事的人——澳門中國口述文學

澳門的咚咚並非源於澳門

喬治·貝依希紐在澳門

雜誌兩屆音樂節主題

澳門現代畫會在新加坡的畫展

費里西亞諾·博達洛·皮涅羅在澳門

藝術家拉法埃·博達洛·皮涅羅生平介紹

澳門在拉法埃·博達洛·皮涅羅陶瓷藝術中的地位

吳漁山的澳門詩

喬治·德·塞納逝世十週年紀念

中文版的《瑪亞一家》

伊內絲·德·卡斯特羅——楊貴妃式的犧牲品

安東尼奧·塞吉奧在澳門——九封從來未發表過的信

十九世紀末葉之澳門：有關喬治·布斯凱《當今日本》某章割記

阿爾諾索伯爵筆下的澳門

百年「華人區」

苦力移民

哀薩·科爾沃和澳門的苦力販運

十九世紀的澳督與澳門生活

十九世紀中葉的澳門——奧地利考察家卡爾·李特·馮·金爾策的報告

一八五四年美國海軍准將佩里看到的澳門

十九世紀的澳門

十六、十七世紀圍繞澳門的葡中關係

文學

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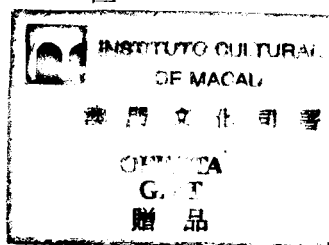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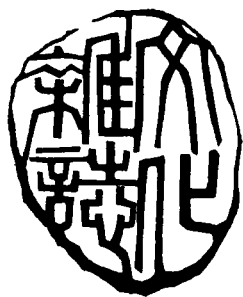
歷史



目錄

《文化雜誌》中文版

第七、八期 澳門文化司署出版



安娜·瑪麗姬·亞瑪羅

格拉塞特·巴特拉

白世門

官龍耀

文德泉神父

伊莉薩爾娃·莫伊塔

章文欽

若昂·C·雷依斯

王鎮英

達尼埃爾·皮雷斯

若熱·迪亞士

文德泉神父

潘日明神父

安德拉德·科爾沃

若昂·格德斯

潘日明神父

若熱·迪亞士

文德泉神父

依查烏·山度士

依查烏·山度士

依查烏·山度士

MACAU

澳門

葡國在東方 的傳播

現況和歷史

現在和過去
的分析

澳門人的分佈

澳門政府新聞司月刊
訂閱地點：板樟堂街壹號
電話：332886（內線123）
圖文傳真：510344

IN
OSQUE
GERA

ES FERREIRA*

no
o por
so de
s de
mento
ia ou
viços
fades
orma
reser-
lacio-
le de

de
7

s únicos da China de h

estuda na univer
das escolas polité
toda a China, fur
centenária, port
milhões de jovens
tam universidade
um privilegiado, t
atingiu este grau
próprio. Agora es

s do
a, de
que,
ui um
onsi-
peu.

° FEST
CIONAL
DE MAC
O NÍV
CHEG
UPER

Fernando



rid Häebler e o viol
certos na Universio



封面說明：

提起十九世紀的澳門，我們選擇了南灣風景這幅油畫。這不是唯一的，但具有代表性的反映當時真實面貌的作品，在作者的筆下澳門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城市，這幅畫描繪了澳門繁華區及主要碼頭——南灣，它曾是鴉片貿易的集散地，也是達官貴人社交活動和貿易的中心。

各種船舶在這裏航行，砲台上巧克力色的大炮傾斜着注視來往的船隻，像坐在面對廣場的露天咖啡館那麼悠閑。蒸汽船以驕傲的鳴笛大聲宣告它的啓航，勢力龐大的英國東印度公司雄踞在城市的制高點。

清潔、朝氣蓬勃的澳門充滿了神話色彩，它是“上帝聖明的城市”。在蔚藍色的天空下，整個城市顯得格外寧靜。



南灣，十九世紀後半葉。作者佚名，油畫（51×63cm）賈梅士博物館收藏。

《文化雜誌》中文版——第七、八期

文章作者

依查烏·山度士

文德泉神父

若熱·迪亞士

潘日明神父

若昂·格德斯

安德拉德·科爾奧

達尼埃爾·皮雷斯

王鎮瑛

若昂C·雷依斯

章文欽

伊莉薩爾娃·莫伊塔

官龍耀

白世門

格拉塞特·巴特拉

安娜·瑪麗亞·亞瑪露

攝影

安祖雷·唯依拉

賈梅士博物館設計部

鄧顯熙

《文化雜誌》對下列機構及個人特表鳴謝：

澳門歷史檔案館、海外歷史檔案館、國立圖書館、市政廳、賈梅士博物館、地理學會、馬偉達、格拉斯·李、美士阿·德·斯娜、特雷莎、張永玲



是一份研究學問的雜誌，自由論壇。其宗旨是推動東西方文化交流，探討澳門獨特的個性及葡萄牙在東方的歷史，進而加強中葡兩國之間的密切往來。

爲此，本雜誌刊登任何有關上述主題的文章，只求學術價值，不限政治見解，文章中的觀點和理論不代表本刊立場。

雜誌編輯部有權不發表或不退回無約投稿。



是一份季刊，葡、中、英三種文字出版，各文版根據不同語言讀者的實際情況，在內容上略有增刪。有心的讀者將會注意到這種差別，並領會我們的意圖。在此，我們向各位讀者、學者和收藏家們推薦，訂閱全套的（三種文版）雜誌會更有參攷價值。

十六、十七世紀 圍繞澳門的葡中關係

依查烏·山度士*

Isaú Santos*

最初的接觸

關於中國的消息最早是馬可·波羅向我們提供的。儘管這些消息雲遮霧障，撲朔迷離，却不失為一件新聞。然而，葡萄牙人對天朝（指封建時代的中國）的真正瞭解是幾個世紀後的事情，這時，“發現”世界已是葡萄牙人的日常所為。

“大發現”的節節向前推進為新的冒險事業開闢了前哨陣地，對中國而言，馬六甲就是如此。1511年征服馬六甲是與中央帝國發生最初接觸的決定因素。到中國去的設想在那裏臻於成熟。

葡萄牙人是怎樣萌發到中國去的念頭呢？“發現”通往印度的海路後，曼努埃爾一世國王得知中國人這一民族的存在，其特點與至此已知的其他民族不相同。這位“冒險”國王對剛剛得悉的消息興奮不已，更加相信馬可·波羅的敘述，遂派遣迪奧戈·洛佩斯·德塞克依拉於1508年2月13日啓程，奉命在聖·洛倫李島（即馬達加斯加島）至馬六甲之間發現陸地和收集有關中國及其人民、商業和宗教的確切消息。

另一方面，阿豐索·德阿爾布克在征服馬六甲後不久便在當地遇到了一些中國人，對他們盛

情款待，並贈予回國所需的物資。德阿爾布克這種態度難道與曼努埃國王收集天朝消息的願望毫無關係嗎？

在“發現”通往印度的海路後，葡萄牙人征塵未洗，便不顧旅途勞頓投身到中國去的新的冒險事業之中。中國的財富當時對歐洲剛剛誕生的資本主義還是禁區。

萬事俱備，到中國去的冒險開始了，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的戰友若熱·阿爾瓦雷斯從馬六甲啓程，向中央帝國進發。

這次遠征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經濟開發性的，儘管應承認我們的開拓者懷有這類意圖。首先旨在獲得關於中國地理的資料，其次瞭解中國主要海上貿易中心的情況。據此推測，早在首次旅行中，葡萄牙人很可能已到過中國主要商埠廣州。

1513年，葡萄牙人到達珠江口的屯門島，若熱·阿瓦雷斯在島上樹起一塊刻有葡萄牙國徽的石碑。

與中國長久交往的意圖壓倒了一切艱辛困苦。1516年，為葡萄牙効力的意大利人拉法埃爾·佩雷斯特列羅奉馬六甲總督阿豐索·德阿爾布克之命試圖再度潛入中國，此次已帶有商業目的。他到過廣州，對所見所聞嘆為觀止，力諫葡萄牙當局，使其對向中央帝國派遣使節的好處深信不疑。

*社會政治學碩士，曾獲哲學、神學和文獻學畢業證書。現為澳門歷史檔案室主任。

佩雷斯特列羅的建議被欣然接納，一支官方船隊從里斯本啓程東來，開拓與中國的外交關係。首領是被冠以“中國之行大船長”顯赫頭銜的費爾瑙·佩雷斯，藥劑師和博物學家托梅·皮雷斯以大使的身份同船前往。

船隊在果阿和馬六甲做了最後的準備後於1517年8月抵達屯門島，接着直發廣州。托梅·皮雷斯及其隨從携國書和贈中國皇帝的禮品在廣州上岸。

費爾瑙·佩雷斯在通商活動方面非常出色，爲了爭取更大的成功，他派遣自己的一個心腹，遠至漳州一帶探索中國沿海，以便獲得有關琉球島的情況。後來葡萄牙人將琉球島命名爲福摩薩。

倘若商業和探索中國沿海情況的使命均馬到成功的話，外交使命却一籌莫展。費爾瑙·佩雷斯、德安德拉特斯的兄弟西蒙·佩雷斯的拙劣表現致使中國當局遲遲不見葡萄牙使節及其隨從。西蒙·佩雷斯是奉命前來打探托梅·皮雷斯消息的專使，抵達屯門島後，他便修築城堡，襲擊中國商船。

中國人籍口托梅·皮雷斯遞交的國書不符朝規，格式欠恭而拒絕接收，使情況更爲嚴重。^①中國皇帝庇護的馬六甲國王對葡萄牙人奪佔馬六甲恨之入骨，請求中國皇帝拒絕接納葡萄牙人，對這些不速之客勿存幻想，他們的目的在於洞察國家情況，以圖侵佔某塊領土。葡萄牙派駐北京朝廷的使館的處境雪上加霜，難以立足。

中國人深爲震怒，將托梅·皮雷斯捉拿下獄。托梅·皮雷斯被長期囚禁，終於死在獄中。

對洋人的反感四處蔓延。皇帝下令驅逐一切夷人，禁止與夷人通商，關閉廣州港口，不准洋船駛入。

葡萄牙人並未心灰氣餒，決定繼續奮進，實現初衷。他們遠道而來，決不願輕易放棄開拓通商，推廣其文明和宗教的意圖。

但是，情況仍無好轉，使者馬爾丁·阿豐索·德梅羅率領船隊試圖與中國締結和平友好通商條約受到了仇敵般的接待，被迫蒙辱而歸。

這種敵視的跡象儘管從1532年延續到1554年

，但葡萄牙人仍經常出入中國的海域和港口，開展商業活動，從未間斷。在中國的一些地方官吏半明半暗的協助下，通商活動甚至繁盛一時。地方官吏也參與了這類有利可圖的交易。無論看起來多麼不可思議，正是在這一時期，葡萄牙人在寧波、漳州等沿海建立了若干殖民區。倘若我們注意到在中國封建統治方式下，中央的權力在省一級是通過總督或達官貴人來實施的就不難解釋這種現象了。總督和達官貴人在地方上是絕對的君主。

漳州的立足地迅速擴展，地方官吏們懼怕事情鬧大會使其與葡萄牙商人勾結之事敗露，便下令禁止與葡萄牙人的來往，並向葡萄牙人開刀，當時居住漳州的五百葡萄牙人僅三十人幸免逃生。

隨着1542年發現日本，打開了新的通商前景。由於中日間互禁通商，壟斷商品經營和流通的葡萄牙人利用這一良機，從中漁利。

形勢稍有好轉，葡萄牙人便借機重返寧波和漳州的殖民區。寧波和漳州的殖民區在對日貿易中得到了驚人的發展。

北京再度感到受到傷害，於1548年下令從兩地殖民區驅逐葡萄牙人。然而，葡萄牙人不屈不撓，毫不洩氣，北方失利，便調頭南下，同樣遭到驅逐。

葡萄牙人合法的或暗中的通商使各方受益。暗中通商的目的是爲尋找一條不連累任何人尤其是不連累中國省級官吏的辦法。在這種通商的可見好處面前，地方官吏們採取了通融的態度。

大約在1550年，葡中商貿關係又有了新的發展：葡萄牙人獲廣州官吏的批准，在位於珠江三角洲的上川島開闢了一個殖民區。後來傳教士聖方齊各就是在該島渡過了晚年。

這個殖民區後來被放棄，葡萄牙人最終在上川島和澳門之間的浪白濤島建立了另一殖民區。

此時中國人與葡萄牙人的關係似乎稍有緩和，葡萄牙人在澳門定居的時刻正迅速臨近。澳門是地處珠江口的一塊彈丸之地，葡萄牙在遠東的存在在這裏得以實現。

這一榮譽歸功於萊奧內爾·德索查船長，他

率領一支海軍艦隊，促使廣州總督准許葡萄牙人在澳門定居，從而使葡中商務和航運關係正常化。

葡萄牙人就是在這一時期（1550—1557）與澳門這個小漁村發生了最初的接觸。

葡萄牙人在澳門定居

葡萄牙人到來時，澳門對中央帝國無足輕重。中國當時專心致力於對遼闊國土的治理，對這個細小的半島很少重視。

澳門的通商與中國內地各省之間的巨額貿易相比微不足道。此外，由於牽扯到與洋人的交往，海上貿易在中國的經濟活動中沒有一席之地，這就是為甚麼內地城市的份量和地位高於沿海鄉鎮的原因。沿海鄉鎮實際上處在地方官吏氣使頤指的治理之下。

沿海居民是一個單獨的階層，靠捕魚和小本生意為生，自成一體。所以，葡萄牙人抵達澳門並未引起中國中央當局的注意毫不奇怪。

葡萄牙人試圖與南方都市（廣州）建立通商關係遇到了重重障礙，各種原因造成的衆多誤解幾乎總是導致功虧一簣。

沒有任何形式的穩定通商關係致使在廣東、浙江、福建沿海的許多商埠出現了得到地方官吏暗中支持的走私。這種令參與各方均不滿足的局面一直延續到1554年。大概在此時期，中國人和葡萄牙試圖重新接近，在上川島開展小額貿易。

這次也未例外。通商活動好景不長，葡萄牙人對此早有預感，他們在島上祇搭了臨時棚屋，於每年的八月至十一月從事通商。

桀驁不馴但心神不定的葡萄牙人約在1555年向東轉移到浪白滯島。

天際中飄動的朵朵白雲預示着葡萄牙人繁盛的前景。他們迅速地向澳門方向推進，繁榮和安定是在等待着他們。

他們抵達澳門的確切日期迄今尚待查證。

現僅確知，1553年至1554年間葡萄牙人仍出沒在上川島和浪白滯島^②。

不過，我們可以將1555年至1557年視為葡

萄牙人涉足澳門的大概時間。

直至萊奧內爾·德索查與廣州官吏簽訂條約前，葡中貿易幾乎都是暗中進行的。此後，才趨於明朗，並形成了新的形式。

澳門是以放棄其他殖民區為代價發展起來的，兩者的明顯對比是定居澳門的永久性和殖民區的臨時性。澳門這個人口為數很少的漁民小村不久變成了商賈雲集的小鎮。

中國人出於何種原因改變過去一味反對的態度，准許葡萄牙人在其土地上定居呢？

這似乎與葡萄牙人應南方官吏的請求驅逐損害該地區中國利益的海盜有關。

葡萄牙人在這一地區的出現保障了航運和通商的和平與安全。從此之後，中國人開始承認對外貿易的益處和昔日關閉鎖國的弊端。

最大限度地從通商中漁利却不直接捲入消極事物之中，這是在葡萄牙人定居澳門中找到的一種途徑。

通過割讓澳門，中國找到了解決面臨的一系列問題的辦法：平息了海盜，穩定了南方，促進了商業，遏止了華人出洋和防止了洋人入境。

澳門從而起到了一個中立區的作用，中國在這裏從外貿中獲益匪淺，自己的文化、宗教和倫理價值又未受到絲毫觸動。中國人從而發現了在澳門既可得益又不冒風險有效的權宜之計。

由於掌握了商品流通和經營的壟斷權，在相當長的時期中，葡萄牙人成為中國、日本、菲律賓、暹羅、馬六甲、印度和歐洲間有利可圖的貿易的絕對主宰。

因此，可以說澳門掌握這一壟斷權達130年之久，即從1555年到1685年，直到康熙皇帝對外開放通商之際。

澳門的政治行政組織

首批定居澳門的葡萄牙人實行的是自我管理。

居民的構成有來自葡國的葡萄牙人、印度出生的被稱為混血的葡萄牙人，無葡萄牙血緣的但信奉天主教被稱之為土著的華人、華人，黑奴、

東帝汶人、暹羅人、日本人和馬來西亞人等。不久人口便迅猛增長。

面對人口膨脹，迫切需一個政治行政組織來駕馭這個人口瞬間增至16,200人（不計婦孺）的小鎮的命運。這樣就為以“陸地船長”形式出現的澳門政府奠定了基礎。“陸地船長”通過選舉產生，1560年首屆由迪奧戈·佩雷拉出任。

隨着政府系統的擴大，新的職務產生了。1582年出現了監察一職，由馬蒂亞斯·佩內拉擔任。為使此職很好發揮作用，佩內拉根據1585年2月16日在馬德里制定的32條細則的正式確切的條文行事。為避免疑問，第一條對其職責作了明確規定：“管轄一切民事和刑事訴訟案件”^③。

澳門人口、商業和財富的不斷增長要求將其升格為市的呼聲愈來愈高。1586年4月10日印度副總督杜阿特·德門內斯伯爵頒發特許書批准升格，其特權、禮遇和禮賓順序等均與埃武臘市等同無異，稍後又得到1596年4月18日國王特許書的確認^④。

1603年1月24日，菲力浦二世國王賦予澳門與印度相同的三年選舉一次法官和民政長官的特權^⑤。

一個處於在迅速壯大的商業資產階級通過市政廳駕馭着政府。城市不斷地發展擴大。

葡萄牙人在澳門定居的法律根據

對葡萄牙在澳門定居的法律根據的看法歷來是見仁見智。但是，我們可以說葡萄牙和外國的歷史學家均深信葡萄牙人定居澳門是由於中國想對葡萄牙人協助驅逐南中國海的海盜予以補償。海盜是當時這一地區不安定的因素。

事實上哪些是葡萄牙人在澳門定居的法律根據呢？讓我們來分析一下外國根據國際法實現佔有一塊領土的各種法律形式。

- 佔有是通過違背中國人民意願的征服？
- 通過廣州官吏的准許但未獲北京朝廷的批准？
- 通過北京和廣州的批准？
- 通過北京的直接批准？

讓我們對這些根據部分地進行分析。

第一種獲得形式可能從不存在，至少沒有存在的理由。第二種似乎也不盡情理，因為將領土割讓給外國不屬一個普通省督管轄權內的事務，而是中央當局即皇帝本人的職權，並要履行莊重的手續。剩下最後兩種可能，第四種同樣不值得考慮，因為像中國當時那樣一個高度封建，因而等級極為森嚴的社會裏，葡萄牙人難以與最高當局即皇帝直接發生關係，況且皇帝對夷人洋物極為卑視。第三種形式看來最有可能，因此值得我們重視。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度裏，祇有一種上下一致的逐級行動才能賦予這類行為以法律形式。首先，可能是知情的廣州當局一總督或達官貴人及其左右勸諫北京朝廷作出了最後決策。

毫無疑問，一份正式割讓澳門的文件應曾存在，無論其甚麼內容，儘管迄今無人見過這份文件。否則，葡萄牙人早已被視為入侵者或不速之客，倘若如此，隨時會遭到驅逐。

正是基於這些假說，我們不難相信，批准葡萄牙人在澳門永久定居的文件確實存在，很可能已經遺失。

阿儒達宮圖書館收藏的兩份文件對解決這一問題能夠提供少許幫助：

一第一份指出葡萄牙人驅逐了在廣州地區橫行的海盜後，中國皇帝將澳門贈與葡萄牙人，但令其付“細銀五百兩”^⑥。

一第二份文件係手稿，把割讓澳門給葡萄牙人歸結為廣州官吏或總督所為^⑦。

有人說是一種租借，租借祇可能通過一種文件來進行。文件的作者是何許人？皇帝？廣州官吏？兩者兼而有之？澳門是割讓，的確如此，有爭議的是通過何種文件？首先，沒有租借的證據，葡萄牙人不會在澳門泰然自若。清朝官吏的定期變動意味着租借要經常不斷地續約，這最終使葡萄牙人不得安寧。

葡萄牙人所處的諸多劣勢，不允許其殖民性定居。同樣割讓換取地租或租金的形式亦沒有合乎情理的解釋。因為，這種形式僅僅賦予葡萄牙人使用權，而不是完整的所有權。

葡萄牙在澳門定居的心理狀態和地位1557年

前與後迥然不同。1557年之前，葡萄牙從一個島跳到另一個島，從一個殖民區轉移到另一個殖民區，1557年之後，在澳門立足定居。

有必要沿此思路略為深入，儘可能地收集一些有助於我們澄清某些問題的資料：

—法利亞·索查在《葡屬亞洲》^⑦中認為，割讓澳門是中國當局對葡萄牙人驅逐廣州地區海盜這一卓越功績所給予的酬報；

—《菲律賓通史》的作者費雷·儒瓦·德貢塞桑持相同看法，他明確指出：“出於對葡萄牙人在一次嚴峻局勢中做出的卓著功績（驅逐廣州地區海盜）的感激，皇帝准許葡萄牙人永駐澳門”。

—阿爾瓦羅·塞梅多也贊同此觀點^⑧。

這類證詞尚有許多，我們還可補充若干：

意大利神父杜·阿爾德在其著作《中國風貌》中持相同看法；

—在中國海游弋的法國海軍的代理主教塞內拉主張同一論點；

以反葡出名的雷依納爾也未能擺脫這種觀點。

一些現代作者一味否定上述論點，他們偏愛帶有中國作家偏見和信仰的編年史記，對上述歷史學家不容置疑的證詞不屑一顧。他們的論據基於馬禮遜翻譯的《中國大觀》一書中關於香山澳的一篇史記散文。

法國傑出的漢學家阿貝爾·雷米扎對馬禮遜的譯文提出異議。他認為，由於偏見，譯文改變了原文的實質內容。在他看來，原文的真實譯文是：

“嘉靖32年（1553），洋船（葡萄牙船舶）在濠鏡停泊，船上人稱遭暴風雨襲擊，海水浸濕船載貢物，乞望允其在濠鏡海灘曝曬。當地統領汪柏應允。他們便用蘆葦搭蓋了幾十間茅棚，但唯利是圖的商人逐漸用磚木石蓋屋。洋人就這樣得以非法進入帝國，在汪柏時期開始在澳門定居”^⑩。

這些作者還引用了有利於其觀點的根據：

—澳門政府在相當一個時期向中國政府交納地租或租金；

—清朝官吏不計其數多次地在澳門行使完全的管轄權；

—中國政府在澳門設置海關，對船舶和商品徵稅。

這類情況被稱為“國際地役”，國際法將此作為對主權的限制，決非對主權的廢除。

讓我們按照這一思路收集一些有助於我們在此方面略作深入探討的其他資料。

從中國的觀點考慮，佔有澳門可能是廣州官吏擅自作主造成的結果，稍後又得到了皇帝的確認，或者可能是一種必須支付地租或租金的租借。如前者可導致所有權的話，那麼後者便引起一個這種不穩定的租借在何種程度能導致所有權的問題。即使回到前一種形式，所有權也可單單因贈與者的意願而終止。

這種脆弱的處境可部分地解釋澳門當局在一些方面對清朝官吏的依賴。

中國在許多世紀中離羣索居這一點也必須考慮，因此，不能對其適用國際法關於獲得領土的普遍準則。中國當時用她自己的準則指導與外國的關係。

從中國決意加入國際社會之時（1858年至1860年）起，援引國際法承認的領土佔有或領土主權的所有形式—割讓、征服、長期佔領、時效—便名正言順了。

讓我們對此作逐一分析。從割讓澳門與葡萄牙人在中國南海驅逐海盜的論點出發，無疑的確是割讓，儘管迄今尚未找到割讓正式化的文件。一方面，倘若葡萄牙人對其關於澳門的權利沒有把握，在漫長的歲月中，他們的行為舉止肯定截然不同。另一方面，如果中國人未對此深信不疑的話，就不會允許事情朝着葡萄牙人永駐澳門的方向發展。

接下來讓我們看看通過征服佔有領土的形式。我們可以頗有保留地接受澳門是通過征服佔領的這種說法。如果葡萄牙人從中國南海和澳門趕走了海盜，並佔領了這塊領土，那麼這是因為征服的是海盜，決非中國人，因為中國人在驅趕海盜的戰役中曾竭盡全力支持葡萄牙人。

現在讓我們談談長期佔領。一個外來國家對

一塊領土的長期佔領可導致所有權，從而排斥他國對該地的所有權，為此需下列根據：

一佔領的領土係無主地，換句話說，它不屬於任何人或已被放棄；

一佔領者有意在此永久居住。

除此之外，在澳門定居的葡萄牙人事先未授權征服澳門，因此，這種佔領嚴格地講不能被視作征服，而是和平佔領。

剩下最後一種形式一時效。時效是結束圍繞私產或公產所有權產生的無休止爭端的積極辦法。在此方面，人們慣常說時間可醫治一切或時間可忘却一切。

中國從未正式責備過葡萄牙在澳門的存在，或許可以說，中國從中失掉的東西不多。

中國向歐洲人開放廣州和其他港口時從未允

許其在中國永久定居就是另一明證。

當中國下令在澳門半島的頸部築起圍牆作為其領土與澳門的邊界時，事實上已承認澳門對其的獨立。

中國也從未允許其公民在澳門立足或定居。

歐洲國家請求里斯本政府批准其在澳門設領時，葡萄牙的主權已得到這些國家的公開承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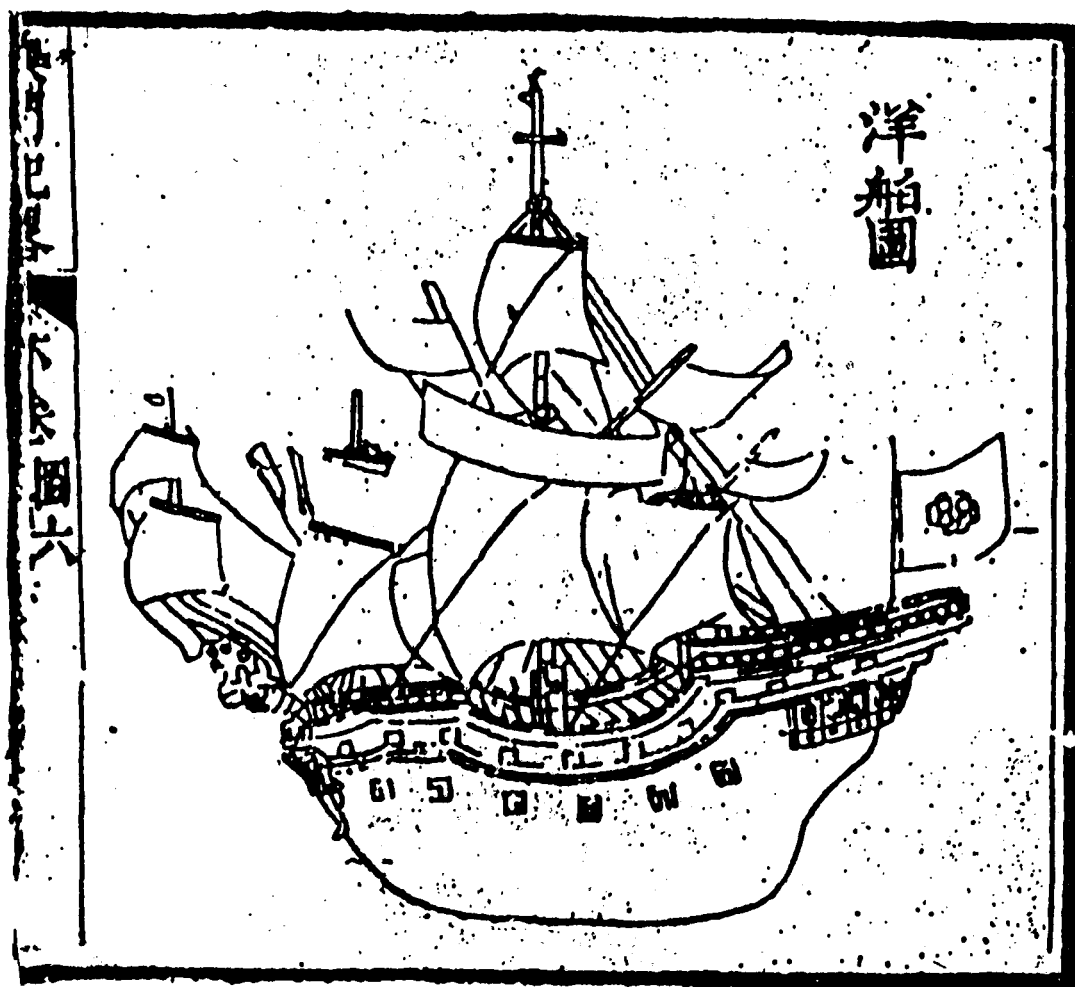
葡萄牙在澳門主權受到的限制

以上順便提及的某些事實歷來被視對葡萄牙在澳門主權的限制：

一向中國當局交納地租或租金；

一廣州官吏對澳門的相當於管轄權的切實權

力；



—中國在澳門設置“左堂”以解決涉及華人的訴訟。

—中國人在澳門港口對貨物和船舶徵稅；

—中國當局借口葡王室船舶係貨船非戰艦，企圖強迫其交納噸位稅；

—1637年一支在澳門港停靠的葡艦隊被扣留，原因是其中一艘的體積超出了許可。

—居住澳門的葡萄牙人離澳時須使用護照；

—中國法律常常適用於葡萄牙人，康熙皇太后過世時的人喪令就是一例。

所有這些事實都值得重視，但不足以使主權失效。我們承認，可能對主權的次要方面造成影響，但並不會損害主權的實質內容。

葡萄牙人享受的特權和照顧（針對其他外國人而言），尤其是在航運和通商方面，使澳門變為天朝與西方國家間通商的唯一貨物集散地。這種狀況導致了財富，引起了清朝官吏的垂涎，他們為達到盤剝澳門商賈的目的，提出令人難以置信的要求，施加五花八門的壓力，比如，禁止供應食品，不准華人提供服務。

下列一些事實淋漓盡致地說明了以上所述：廣東總督強烈責難葡萄牙人在澳門設立法院和管理司法，聲稱准許葡人在澳定居決不意味着司法管轄權。可是，當澳門市政廳萬般無奈遞上銀錢時，總督便緘口息怒了。

隨着澳門日富一日，清朝官吏的勒索便愈演愈烈，澳門對其的依賴越來越甚。他們主宰了澳門的命運，因為他們完全左右了澳門的生計，當時修船師、石匠、裁縫、鐵匠和食品都來自中國。

缺少這些人力物力，澳門最終是清朝官吏的掌上玩物。

如果僅僅由於所處的這種逆境，澳門便難有作為的話，那麼，即使這個城市是通過國際法和中國均承認的形式獲得的又有何用呢？

在崇尚權力的清朝官員的擺佈下，澳門祇有期待時來運轉。

別無他途，市政廳頻繁地開會，商討如何滿足清朝官員的貪得無厭。任何論據，無論我們認為多麼確鑿有力，在“或者屈服，或者滅亡”的可怖困境面前也顯得蒼白無力。

結 論

適才我們目睹了這塊彈丸之地的偉大歷史經歷了意義最為深遠的階段。16世紀初一羣葡萄牙人涉足遙遠的最早年代雖已成為遙遠的過去，但仍繼續為葡萄牙的歷史增添篇章。

澳門的歷史在整個葡萄牙殖民史中無疑是最難敘述的歷史，這是因為，在這塊彈丸之地上，兩種迥然不同的文明相互交織。從中產生衝突是很自然的，過去需要並肩走過漫長的道路才能消除許許多多的齟齬，兩個民族方能相互理解。途中必然是崎嶇曲折反反覆覆，但澳門的生活模式却與中國的相去不遠，在人文方面澳門不可能擺脫中國的巨大影響。

澳門作為葡萄牙的歷史即將終結，正迅速接近尾聲。帝國編織的最後一張網絡將很快解體。何種前途在等待着澳門？我們但願是和諧進步的進途。

註釋

①中國皇帝的排場在十八世紀乾隆給英國使者麥卡蒂尼的回折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朕奉天意令英王斟酌朕的告諭，爾的使者須在朕寶座前跪拜。聞來書甚慰，書中謙恭之意使朕心大悅。然，派遣使臣來此長駐及在朕的港口通商之要求絕難接受，因與本朝亘古不變之規相悖悖”。

阿蘭·皮爾菲茨 《部族間文化的衝突—倫理及政治學的回顧》第107頁。

②查爾斯·博克塞《中國風貌》第16頁引用的費爾璠·門德斯·平托1555年11月20日的信。《澳門歷史檔案》第七卷第213至214頁。克里斯多旺·阿雷斯《費爾璠·門德斯·平托》第78至79頁。

③海外歷史檔案：澳門散記第一櫃第一卷。

④澳門歷史檔案第一櫃第一格。

⑤海外歷史檔案：澳門散記第一櫃第二卷。

⑥西爾瓦·雷戈《葡萄牙在澳門的存在》引述的“澳門最初的關係及怎樣維持至今”。阿儒達宮圖書館51V—40，F L 232/ 234。

⑦阿儒達宮圖書館49—V—5，F L 3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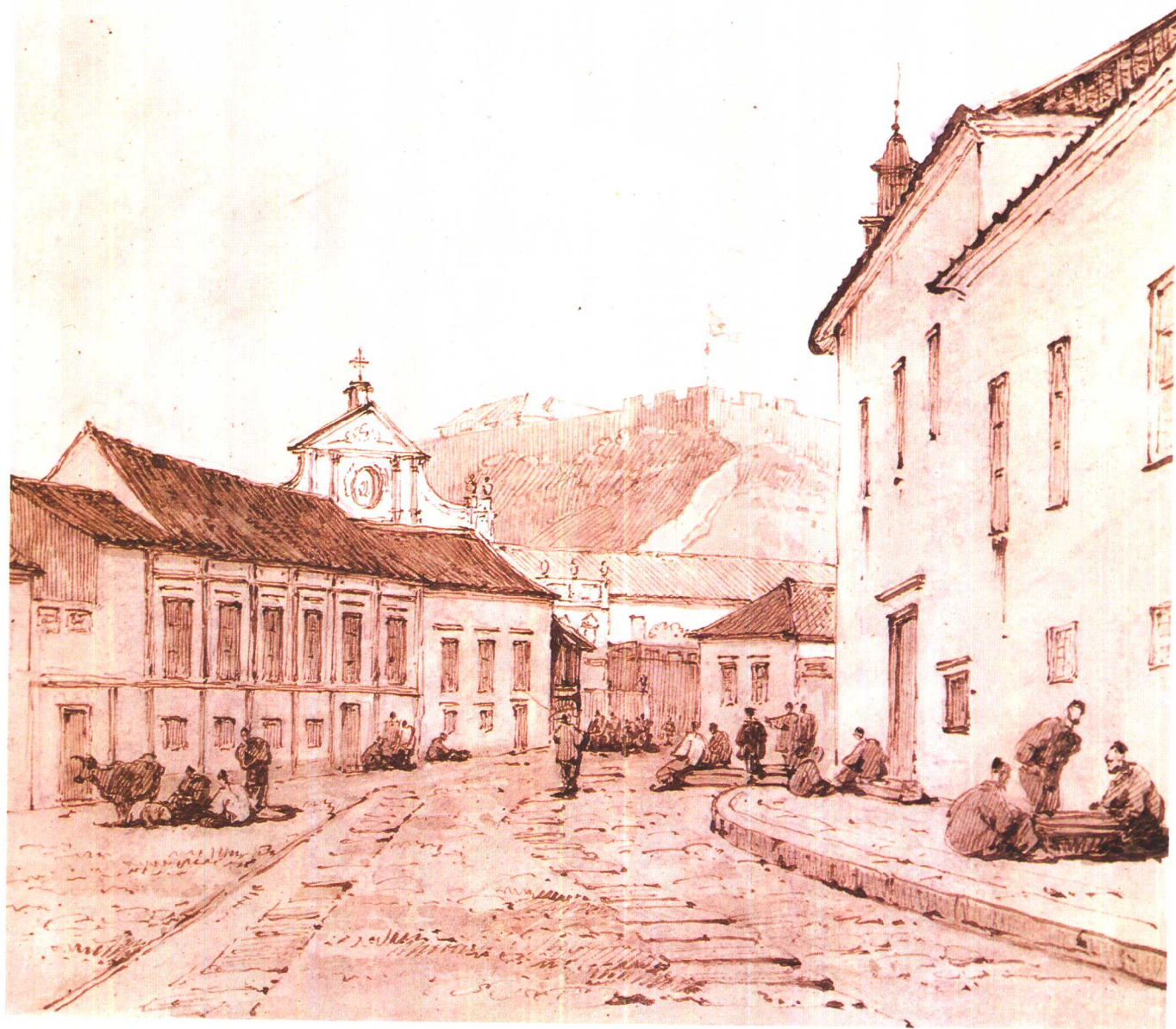
⑧該書第三卷第三部份第二十一章。

⑨《中國的關係》1643年版第二部份第一章。

⑩《葡萄牙對澳門的領土主權之備忘錄》中引用的《東印度及中國之行》第二卷第7頁。

⑪《葡萄牙對澳門的領土主權之備忘錄》第18頁。

⑫阿蘭·皮爾菲茨 《部族文化間的衝突—十八、十九世紀旅居中國的西方人》第112頁：“在英法1856年至1860年與中國開戰期間，中國不得不承認各國列強一律平等。”



聖多明各教堂

作者：喬治·錢納利

鋼筆畫20×20cm（賈梅士博物院收藏）

十九世紀的 澳門

本期文化雜誌是介紹上個世紀澳門情況的專輯，它的內容涉及到澳門的總督和他們的政績，澳門這座城市及其演變過程，澳門人的習慣和澳門社會情況，經濟生活及貿易的興衰，在這裏發生的苦力和鴉片販運，這座城市的基督教特點和中國特色，等等。本期所載的一些文章記述了十九世紀澳門的生活和歷史，它的作者包括曾耳聞目睹那一時期澳門情況的著名藝術家和來訪者，其中包括：科摩德羅·佩瑞；喬治·博蓋特，卡爾·翁·切澤，阿爾諾索伯爵，喬治·錢納利，羅伯特·埃略特，希爾德布朗特，托馬斯·沃臣，奧古斯特·博爾傑等。另外一些文章則是一些現代歷史學者和研究工作者的作品，作者中有文德泉神父，潘日明神父，若熱·迪亞士，若昂·格德斯等。我們力圖使我們今天的讀者可以通過本期的文章對澳門當時的景象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好像看到一幕在這小小的城市舞台上上演的社會戲劇：它有它特有的形式，不同的片斷；典型的表演方法，不斷變化的佈景，節奏和光線，以及它潛在的精神。根據表現十九世紀澳門這樣一個大計劃，我們把鏡頭攝向了澳門這個迷宮一樣的城市這裏和那里，以求勾劃出這個城市頗有生機的日常生活中的細節。出自錢納利之筆的一系列文字經過我們去粗取精的整理之後已成為我們“拍攝藝術”的主要脈絡。在此特別感謝澳門市政廳主席以及安東尼奧·彼德羅·皮雷斯博士（賈梅士博物館代理館長），他向我們提供了本期所需要的圖片資料。這次我們發表的一些有關十九世紀澳門情況的圖片是極珍貴和從未發表過的。

唯賢譯

一八五四年 美國海軍准將佩里看到的澳門

文德泉神父 *

Manuel Teixeira *

商業的衰落

美國海軍准將馬修·卡爾布雷斯·佩里在《美國海軍遠征中國及日本記實》一書中敘述說：在澳門居住使他有機會對澳門的觀察遠遠超出了偶爾來訪的所見所聞。昔日的澳門商業茂盛，一本萬利，遐邇聞名。如今却已蕩然無存。眼下澳門似乎僅依賴小額沿海貿易，小股駐軍的軍費以及來澳門避暑肆意揮霍的英美富商的消費來維持。葡萄牙的司法管轄權實施的範圍很小。中國人的產業好像正在吞噬所有空間。確實，居民的構成大部份已都是中國的男男女女，他們在葡國人和外國人家庭式的商行中從事最低賤的工作。中國人還開店舖，小作坊和在集市上做生意。葡萄牙人從事甚麼行業則很難概括。

葡萄牙人除少數富商外，大多都清貧不堪，但却盛氣凌人，恥於勞作。不過，有些人在外國人的商行擔任抄抄寫寫文案，而大多數則閒居混日，坐享先輩遺留下來的巨額財富，即使淪落貧困潦倒，以乞討為生的境地，仍居住着澳門過去鼎盛時期修造的豪華別墅。

*澳門傑出的葡萄牙和教會在東方的存在史學家，曾發表過上百篇論文。許多國際學會和機構的會員，亞洲歷史學家國際協會理事，葡萄牙歷史科學院院士和委員。

葡萄牙人軍事力量的標誌仍然存在，十七世紀在四周圍山上修築的城堡似乎足以令中國人對葡萄牙人敬畏。倘若中國人略微再強大一些，便會易如反掌地把不討人喜歡的葡萄牙人一個不剩地驅逐乾淨。

葡萄牙駐軍由二百名正規軍和二百名地方民兵組成，個個紀律嚴明，服飾整潔，衣冠筆挺，實屬罕見。

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值得一提，在執照被吊銷前該公司曾把澳門作為對華貿易的貨物集散地。一些漂亮別緻的別墅就是這家闊綽的公司或講究排場的葡萄牙人在其富裕繁盛時建造的。其中一棟精心修造的富麗堂皇的別墅在佩里准將到澳門時以伍佰美圓的年租便可租到。這棟別墅靠大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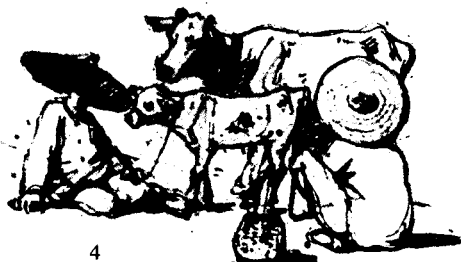
3



1



2



4

開支保持完好，並帶有面積達一公頃多的花園。此處另一個優點是富有浪漫色彩，可與詩翁賈梅士的名字聯在一起，因為，這裏曾是賈梅士寵愛的幽居之地。正如讀者所知，賈梅士的紀念碑就矗立在那里。

澳門在豐饒之時，許多葡萄牙的商業船隊正是從這裏啟程遠征日本。羅馬教庭也在澳門設立過由可怕的宗教法庭^①支持的權傾一時的教會機構。宗教法庭昔日在遠東維繫其最黑暗最殘暴的宗規。

然而，時至今日，繁華的盛況和商人的壯舉均已消聲匿迹，教會不可一世的恐怖統治及其殘忍的法庭^②在一貧如洗的神父孱弱的手中坍塌瓦解。神父們低聲下氣地乞求施舍，僅靠為數不多的葡萄牙人的捐贈渡日。

自建大船始，來澳門的船舶能駛入內港的寥寥無幾，但是，內港的水深足以接納沿海貿易使用的懸掛葡國國旗的商船。這種名為西式中國三桅船造型奇特，難以名狀。中國帆船也能駛入內港，偶爾也有雙桅雙帆船或雙桅縱帆船。航速每小時13節半的南安普敦號補給船也曾在內港拋錨。漲潮時，航速13節半和14節的船隻均可在內港停靠，其他類似的船隻可到城市對面的氹仔島拋錨。葡萄牙的若昂二世號^③海防艦正是在氹仔港停泊時發生爆炸的，當時在附近停泊的美國馬里恩號輕型巡洋艦及時趕到救援。出事那天是國慶節^④，艦上一名炮手對慶典籌備工作玩忽職守，受到艦長處罰。一般推測是這個炮手蓄意炸毀艦艇。

來澳門的戰艦和大噸位商船在距城市3至5海里的地方拋錨，與岸上的聯繫十分不便，氣候惡劣時，聯繫完全中斷。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致使佩里准將建議把海軍補給站移至香港。佩里准將在給海軍部長的報告中詳盡地闡述了他的見解。他當時指出，由於諸多不便和由此引起的延誤，使美國供給艦隊的物資特別是煤炭在澳門卸船費用增加。為此，有必要在香港設補給站。過去在香港曾設有海軍基地，後來在俄勒岡問題^⑤引起的動蕩時期，海軍基地外遷，因為當時人們估計與英國的破裂迫在眉睫。

現在既然上述麻煩已不復存在，國家財產在香港無疑比在城防空虛的澳門更為安全。香港作為停泊地得天獨厚。因為，大型艦隻祇可以在距岸七百碼風平浪靜的海中拋錨，各種物資均能全天候補給，岸艦之間的聯繫十分便利。唯一不利條件是香港衛生很糟，但這不會危及生活在海上的水兵，他們從未受到岸上比比皆是不良現象的影響。況且香港本身是一個大市場，可以供給海軍艦隊所需的補給品，並擁有維修保養艦隻的設施。

艦隊即將出發之際，佩里准將已為在香港設煤炭和補給品倉庫做了一切初步的和必要的安排，並下令運煤船和補給船在香港卸貨。

1. 一羣“告家婆”與小童在一起（1835）
2. 賭客（1842）
3. 小販（1835）
4. 放牛
5. 漁民
6. 算命（1836）
7. 漁民與竹籬
8. 賭客



5



6



7



8

佩里准將認為澳門是極為舒適愜意的幽居之地，岸上美麗如畫的景色使人興致昂然，有趣的異國社會情調為城市增添了許多迷人之處。他在澳門居住期間，結識了不少當地居民，包括一些在澳門有消夏別墅的廣州商人。酷暑盛夏，這些廣州商人便來澳幽居，用最豐盛最精緻的佳餚款待賓客。

法國駐廣州的公使^⑥德·布爾布隆先生在澳門有一棟官邸，他和他在華盛頓使團當秘書時結為伉儷的美籍夫人^⑦一起使當地的社交生活非常活躍，令人留戀。

法國海軍准將德·蒙特拉維爾先生曾率艦隊駛抵澳門，在港外海域停泊。佩里准將曾有機會與他交往，並與德·布爾布隆先生以及澳門的名流，互相做東宴請。這無疑表明他們注重禮尚往來。

吉馬良斯總督^⑧是葡萄牙海軍軍官，佩里與他過從甚密，他們是在非洲海岸結識的。佩里與洛倫索總督^⑨的關係亦是如此。這些軍人們在其公務往來中，言談舉止彬彬有禮傳為佳話。

佩里與英國的中國事務總監兼香港總督喬治治爵士^⑩、香港陸海軍司令、清朝官員及地方當局的关系充滿了友好情意。

重提並非無的放矢。第一件事是由一種宗教狂在不同信仰的異國無節制的衝動這種不智行為引起的。

香港教士學校的一位英籍青年^⑪來澳門觀光。上岸不久，遇到了天主教國家常見的宗教遊行。人們抬着聖餅，隆重行走在主要街道上。隊伍中有許多神父，還有人身着唱詩班服飾，他們手秉點燃的臘燭，晃動着香爐，充滿了羅馬宗教儀式的色彩。

這位年輕人，很可能平生第一次看到這種獨特的表演形式，認為是對基督教的侮辱。也許他不懂得尊重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異教徒的虔誠，於是，對此盛況表示蔑視的念頭便油然而生。隨後便大搖大擺地站在遊行隊伍途經的街上，當隊伍經過時，拒不脫帽。倘若他出於信仰的不同，不願參加這種活動，可以迴避，轉身另覓他徑，許多基督徒在天主教國家就是採取這種辦法行事。但這位年輕人却沒有採能這種既可維護自己的信仰，又可允許異教徒根據自己的觀念行事這種簡便易行的做法。神父們見這位青年頭戴帽子，故意擋道，便彬彬有禮地請他或者脫帽或者離去。然而，他非但不理睬，反將帽子往頭上壓了壓，

英人事件

1849年，在深孚衆望的優秀軍官亞馬留任總督時期，澳門發生了兩起事件。儘管香港的報刊對此已作過報導，但這些事件還突出表明了葡萄牙人財運敗落和民族的憂郁心態。因此在此舊事

9. “踢毬者”及圍觀者

10. “大排檔”



9



10